

移民文學的新思路：從「民族性」到「流動網路」

徐聰

摘要

「移民文學」作為當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不僅在文學史上有着重要意義，在文學批評當中同樣成為各種理論分析範式的一個實踐場域。本文通過對於舊有的移民文學分析方式的梳理，結合中國當代移民歷史與移民文學作品現狀，嘗試梳理出移民文學的新範式，作為闡釋當代文學的一種新思路。

關鍵詞

中國當代文學 移民文學 民族性 流動網路

一、前言

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大部分分類方式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也使得諸多概念變得非常含混，譬如「移民文學」與「新移民文學」。如果僅從概念名稱本身來看，「新移民文學」詞彙結構類似「新歷史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即概念本身似乎是基於「移民文學」的概念所提出的，且兩者有非常明顯的時間間隔。然而事實上，「新移民」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潘凱雄的論文〈熱熱鬧鬧背後的長長短短——關於「新移民文學」的再思考〉。¹在這篇論文中，潘凱雄將「新移民文學」定義為與「留學生文學」、「域外題材文學」相似的概念，並稱此概念為「從作者的身份或是作品的題材指向上來概括一類文學現象」。這意味着概念中「新移民」最初所指的是作者身份與作品題材，而並非文本本身。但在之後，不少批評者有時會將「新移民文學」與「移民文學」混用，有時也會在字

¹ 潘凱雄：〈熱熱鬧鬧背後的長長短短——關於「新移民文學」的再思考〉，《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2期（1993年3月），頁20-23。

面意義上認為「新移民文學」是基於「移民文學」的概念。²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新移民文學」的概念一直在擴張當中，並逐漸開始涵蓋「移民文學」，開始被批評者廣泛使用。

可以說，在大部分批評者在進行討論的時候，作家的生活經驗、寫作題材與寫作方式在批評者的概念中並沒有明晰的分界，甚至是多數情況下被混同。而在這種並不明晰的狀態當中，「故國」、「華人」、「域外」等地理上並不絕對但是帶有民族性的詞語成為了定義的關鍵要素。總體而言，大部分批評者在對於移民文學進行分析形成了一種「民族範式」，即以民族性為中心的分析方式。³

當利用民族範式分析文本的時候，大部分文學批評呈現以下特點：首先，批評者的理論武器大部分是「民族性」及其衍生概念；其次，這些批評在面對文本的時候也往往聚焦於個人的民族認同問題，在討論之後，「民族認同」成為了解決「去國懷鄉」、「認同焦慮」以及「邊緣人」等等問題的唯一答案。此外，大部分批評中都以對比思路對移民文學文本進行分析，如：中西對比、男女對比、文化環境對比等等。

審視當下，全球化的生活已經滲入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無論是國家之間，還是民族之間的完全割裂顯然不再可能。所以，筆者希望用另一種範式重新對移民文學進行分析。當然，這並不是簡單否定民族性存在的意義，作為一個成熟的學科工具，它確實解決了諸多問題。但同時，這個理論也需要保持開放。如魯迅（1881-1936）就是「中國知識份子中最重視研究自己的民族、最深地瞭解自己民族的特性的。他對中國的民族性進行了最深刻的解剖，最清醒地正視中國民族性中的弱點，而在正視民族性中的落後面時，又最堅定、最真切地肯定中國民族性中的優點，看到它的偉大、崇高的一面。」魯迅並且沒有把民族視為「單一的，封閉結構的、僵死的東西，而是把它看成處於發展過程中的流動物。」⁴

筆者認為劉再復對於魯迅民族觀念的讚賞正是由於魯迅指出了民族中的流動特徵。這一特徵與新移民文學有着相通之處。既然筆者不打算完全使用民族範式，那麼也並不想依附於之前對於「移民文學」，或是「新移民文學」的定義。筆者希望找尋的是移民題材本身的特殊性質。從過去的魯迅，或是移民文學的寫作者，抑或是移民文學的批評者，不少論述都談論到了一個字：「流」。流動可以說正是移民文學的關鍵定義所在。甚至於拆解「移民」本身的時候這個詞就帶有着流動特質。「移」為「移動」，「民」即「人」。人的流動性構成了移民的重要性質。

所以，本文的主旨是建立新移民文學的流動範式，並對移民文學文本進行分析。但筆

² 詳見洪治綱：〈中國當代文學視域中的新移民文學〉，《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頁132-155；豐雲：〈跨國主義視野中的新移民文學〉，《東嶽論叢》2010年第11期，頁84-87；吳奕錡：〈尋找身份——論「新移民文學」〉，《文學評論》2000年第6期，頁67-72。

³ 參汪暉：〈預言與危機（上篇）——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文學評論》1989年第3期，頁17-25；曠新年：〈民族國家想像與中國現代文學〉，《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頁36；陶東風：〈告別花拳繡腿，立足中國現實——當代中國文論若干傾向的反思〉，《文藝爭鳴》2007年第1期，頁6-24。

⁴ 劉再復：〈文學「民族性」的二元性與流動性——關於魯迅民族性觀念的思考〉，《學術月刊》1981年第8期，頁1-6。

者不想僅僅用「流動的人」匆匆概括移民文學。因為時至今日，流動本身早已不僅包括人。在之前的文學批評中，「流動性」之所以不能成為一個重要的母題，一個原因恐怕是當時的流動性遠沒有今天的紛繁複雜。當代移民的流動情況不僅是人可以進行流動，也包括一切物質都可以進入到流動之中。移民的這一行為不過是整個社會流動性最為表面的一個小部分而已。人的流動表面上是自己選擇，實際上無可抗拒——每一個還在社會中的人總會不自覺地進入流動體系當中，成為流動的一分子。

二、移民文學中的 3 次移民潮

當然，僅僅提出「流動性」這一概念並不足以涵蓋整個移民文學的創作。如何流動、流動中的內在區別都是值得考察的。如果說移民文學本身不可否認是隨着移民這一行為而產生的，那麼，移民文學這一定義的分類與擴張，或許也應該隨着移民本身的過程進行變化，呈現出不同的創作向度。所以，如果希望確立中國當代移民文學的流動性研究範式，首先應該以流動性為依據，將中國當代的移民風潮進行一定梳理與總結，並在確立起移民的具體的時間跨度之後，考察不同時段的流動性的不同，並尋找對應題材的文本，進行討論後最終確立起流動範式。

當代的移民潮何時起源？根據社會學學者的研究，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當代的移民潮起源於 20 世紀 70 年代。對於當代移民歷史至今分為幾次浪潮，不同學者有着不同的分析方式。但是，學者們對於幾個浪潮的分界時間點有着共同的認識。首先，1976 年是移民浪潮的起點。76 年作為起點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結束，政治上的減壓使得人民有機會開始移民。第二個時間點為 1985 年 11 月，中國政府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以法律形式確定了申請出國是中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意味着中國政府開始關注移民這一行為本身，並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辦法。但是，有了管理辦法之後並不意味着移民行為本身走向了有序，反而是更多的人選擇了偷渡這一方式。經過了 1993 年「金色冒險號」的偷渡事件後，1994 年，全國人大做出了《關於嚴懲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犯罪的補充規定》，以使得移民方式規範化、法律化。⁵

當然，在制度上，直到今天中國的移民政策並沒有發生甚麼變化。但是隨着社會的不斷開放與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媒體從業者與學者已經感知到了另外一次更為洶湧的移民大潮，並命名為「第 3 次移民潮」。⁶生活品質、子女教育、自然環境、社會保障等因素構成了移民的原動力，而途徑包括技術移民、投資移民、留學移民等諸多移民方式。

總體而言，當代移民潮分為 3 種類型。第 1 類移民潮時間是上世紀 80 年代，由於國

⁵ 劉瑩：〈浙南跨國移民潮的歷史變遷〉，《南洋問題研究》2009 年第 1 期，頁 66-73；李明歡：〈歐盟國家移民政策與中國新移民〉，《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4 期，頁 105-112。

⁶ 唐雲、馮江平、李媛媛：〈「第三次移民潮」的「來龍」與「去脈」〉，《商》2015 年第 14 期，頁 78-79。

內的經濟狀況較差，移民的原因往往是為了出國賺錢謀取生存，故而移民者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為主體，在本文中稱為「底層偷渡移民」；第2類移民潮時間是90年代，隨着經濟與資訊的逐漸開放，移民的原因往往是期望離開中國以獲得外國國籍，故而移民者以打工者與留學生作為主體，在本文中稱為「留學打工移民」；第3類移民潮時間是21世紀到今天，全球化的進程逐漸推進與中國經濟的日漸發展使得移民的原因多種多樣，在本文中稱為「投資技術移民」。

（一）第1次移民潮：偷渡與陳希我的《大勢》

在當代移民小說中，對於作家來說，最為難以描寫的顯然是「偷渡」過程。偷渡這一行為本身便處在一個法律的灰色地帶，而讓作家對於偷渡行為進行體驗顯然也是不現實的。而在比較少描寫偷渡行為的文本當中，陳希我在《大勢》中的書寫無疑最為值得注目。在《大勢》中，他並沒有像一個社會學者那樣對偷渡過程進行詳細考證，而是將寫作重點放在偷渡後移民者的生活狀態上。整部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主角王中國是國內的一名普通中學教師，他在國內生活的窘迫與制度的種種限制，使得他選擇偷渡出國謀求生存。當他到了日本後，他工作不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自己的女兒在日本能有一席之地。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底層生活之後，他又將自己的女兒以合法的方式移民日本。但當女兒王女媧來到日本之後，王中國無法接受她與日本人佐佐木的戀愛——儘管佐佐木家庭條件優渥，且對於中國人沒有任何種族偏見，但王中國仍舊堅持己見，通過矇騙的方式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性無能的中國人。

王中國為何不能接受自己女兒與日本人的戀情？儘管在文本的起始，王中國有着非常強烈的融入日本社會的欲望，但是他在文本中所表現出的對於女兒的虐戀與畸形的民族自尊使得他無法接受女兒嫁給一名日本人的事實，並在心中湧現出了相當矛盾的複雜情感。一開始王中國對於日本的感覺是「我們要離開整個中國人群。那麼我應該讓女兒上大學，考上名牌大學，進入日本人世界，進入他們的主流世界」。⁷而當女兒王女媧的男朋友佐佐木與他相見的時候，他對於日本的仇恨立刻浮現了出來：

佐佐木所以一再敢來，就因為在他眼裏，我並不算甚麼。是啊，我算甚麼？一個中國人，還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難民！……強者征服弱者，使用暴力。弱者反抗強者，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除了以暴抗暴，別無選擇。弱民族的暴力恰是產生於抵抗外族的強暴之中，除了以暴抗暴，別無選擇……現在想來，我對女兒的暴力，一點不差於當年的日本兵。⁸

可以說，陳希我的寫作是一種更為極端化的「魯迅式」的書寫。他聚焦於民族性與個人極

⁷ 陳希我：《大勢》（廣州：花城出版社，2009），頁118。

⁸ 陳希我：《大勢》，頁231。

端情感的複雜交織，從而考察人性的隱秘，這也正是陳希我慣常的寫作風格。他往往將人推向一種複雜而又極端的生活狀態當中，而不將大多數筆墨施加於人真正生活狀態的考察。不知道是否是陳希我的刻意舉動，他將偷渡者移民後的狀態也變得極端化。他沒有交代王中國這一干偷渡移民者在日本築地市場的工作狀態，並將王中國在日本的大部分活動都限制在了一個中國移民者的聚居區「陣地」當中。這個空間缺乏與整個外部環境的交流：偷渡者們只能與其他的偷渡者居住在一起。

王中國作為偷渡者提供的啟示在於偷渡者身份本身的一種割裂。他們在法律上不屬於移民國，在生存狀態上又不屬於自己的母國。這種割裂狀態使得偷渡者成為了一種夾縫狀態生存中的人物。比如王中國希望居住於「陣地」當中，他就不得不假借王國民的轉租，從而得以生存。這種灰色的空間使得外部的流動被隔絕在了空間之外，成為了一個凝固的空間。在《大勢》中，陳希我提到這樣一件事：

雖然是在 21 世紀，但在「陣地」，時間是凝固的。記得有一年，一個人回國探親，帶出來許多大陸或港臺的電視連續劇，還要了一台家庭用卡拉 OK 播放機。國內人大為吃驚：這東西國內人早就不玩了，原來是「洋插隊」，整個一個洋鄉巴佬。這個華人社會跟所在國的現代社會沒有關係，甚至也不如發展中的中國國內。⁹

在這段描寫中，陳希我不僅指明了偷渡者們所居處時空的靜止性，他同時也指出《大勢》中「民族認同」的時空邏輯，即：當時空變得封閉與靜滯的時候，民族才能完全支配移民者的所有行動，或者說，本民族的認同感是由於空間被限制的生存境況中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疏解方式。對於王中國來說，偷渡生活中外部流動性的喪失使得他困在了精神監獄當中。最終他只得抓住中國傳統的精神價值，而後這種精神價值迅速轉化成了男尊女卑的傳統滿足感。而當時空流動起來的邏輯是甚麼樣的，陳希我在《大勢》中並沒有進行討論。

（二）第 2 次移民潮：留學打工移民的時空二重流動

如果對以第 2 次移民潮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進行梳理，很顯然其作品量佔據移民文學的大多數。其原因不僅是因為這一移民潮中移民者的數量較大，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文本的作者作為第一批真正合法的移民者，顯然比之後的移民者更有傾訴的願望。作家閻真正是眾多移民者中知識份子的代表。他歸國後將自己的移民經歷創作成小說《曾在天涯》，並詳細探討了移民者的個人認同問題。如果說《大勢》中將個人認同問題歸結於民族，是由於偷渡本身帶來的環境割裂，那麼在閻真的小說《曾在天涯》當中，個人認同問題的產生有着更為複雜的內在原因。小說的結構並不複雜，主要講述了國內的一個高校教師高力偉隨自己海外留學的妻子林思文移民加拿大的過程。在國內的時候，兩人被周圍的人認為是非

⁹ 陳希我：《大勢》，頁 78。

常合適的一對夫妻。丈夫高力偉有才華，妻子林思文美貌且順從於丈夫。但是來到了加拿大後，高力偉的生活和婚姻遇到了一系列的問題。最開始他所需要面對的最為直接的問題無疑是經濟上的困窘。在國內生活於社會中上層階級的高力偉來到加拿大之後並不像自己妻子一樣可以通過拿獎學金生活，只得進入就業中心來尋求工作。閻真描寫了一段高力偉應聘的遭遇：加拿大的面試官由於種族偏見無視了他的請求。可以說這次應聘經歷是高力偉認同危機的最初起始。因為在一開始高力偉來到加拿大所面對的不過是兩種消費水準的差異背後經濟價值偏差，而在應聘的過程中，高力偉面對的是經濟所不能解決的種族與制度問題。除此之外，高力偉另外一個挑戰是自己妻子對自己的逆反。高力偉結婚前選擇自己妻子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由於妻子的順從，然而這一切在加拿大發生了改變。擁有自己的主見、不再事事與自己的丈夫商議的林思文成為了不斷壓垮高力偉的稻草。婚姻中雙方社會地位的不對等使得最終兩人的情感走向盡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兩人身份的不對等源於社會的制度問題，然而林思文同時也只是一個暫時的「受患者」。作為一個黃皮膚的外來移民，被邊緣化顯然成為了一種必然，更無須說「融入」，或是進入上層階級了。在研究生學位結束之後，當林思文進入到加拿大的社會中開始工作的時候，她的學位變得毫無用處。她開始逐漸理解高力偉，或者是理解高力偉生活中的資本邏輯，並將物質作為最為關鍵的擇偶標準。而高力偉則在與林思文離婚之後，逐漸解決了自己的生計問題。他不僅在加拿大的餐館中當起了廚師，還化名「孟浪」，開始在加拿大的華文報紙中寫文章。很顯然，「孟浪」的名字表明高力偉仍舊有着對於自己知識份子身份的一種隱含的期待。他發表的作品也吸引了鄰居張小禾的傾慕。一方面，高力偉用着自己風雅的一面與張小禾交往，但同時，在加拿大的生活經驗使得高力偉一直有着對於資本邏輯的擔心與恐懼。很快，在賺了四萬餘加元的時候，高力偉再次丟失了自己的工作。在張小禾的建議下，高力偉走訪了不少的餐館，卻只發現了機會的渺茫。最終，高力偉選擇與張小禾分手，返回祖國。

閻真這樣描寫高力偉在加拿大尋找創業機會的過程。高力偉認為「世界是人體驗中的世界，一個人只能從自己的基點去理解世界，這樣才有了朋友有了親人，有了祖國，這樣那些渺小的平庸的轉瞬即逝的痛苦和幸福才有了意義，這樣那些終將化為烏有的事情還是值得去做，人間的一切才能夠得到說明。」而當他真正着手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的時候，他發現的是「這個兩萬人口的法語城市，已經有了十一家中國餐館」。高又遇到了一個因愛情而移民加拿大的中國人，而他的勸說打消了自己對生活的最後一點希望：「天下只有偉大的熱情，沒有唯一的愛情。今天我和她也是平平淡淡過日子，換個女人怕也差不多吧。付出太多了。」¹⁰所以，在作品最後，高力偉最終毅然決然地選擇回國——這也是閻真自己的態度。那麼一個問題在於：如果回國解決的是自我認同的問題，那麼為甚麼回到自己的祖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值得欣慰的是，回到國內的閻真得以成為中南大學的教授，作者自己所經歷的流動性

¹⁰ 閻真：《曾在天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頁 337-341。

危機回到國內確實得以解決。而《曾在天涯》中的高力偉回國後，如果種種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那麼這恐怕只是作者的一廂情願。畢竟小說中高力偉的個人條件與現實中的閻真相去甚遠。在這裏，文本《曾在天涯》成為了一個人雖然流動，但是空間靜止的文本例證。

（三）第3次移民潮：投資移民資本邏輯的局裏局外

如果放眼以第3次移民潮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主要呈現以下特點：作品數量有所減少；民族認同問題鮮有提及；寫作方式不再局限於自己移民的生活體驗，而注重描寫移民群體的生活狀態。這種移民文學的典型代表是海外的商戰題材小說：即通過投資移民海外的中國富豪如何以國外的眼光跨地區的介入資本運作當中。其中比較著名的作品是柯兆龍的《局裏局外——溫哥華的中國富豪》。在整部作品的開始，小說就提供了這樣一幅景象：幾個中國移民加拿大的富豪，一起在溫哥華商討投資機會。海外富商余國偉「因為生意在國內，在上海溫哥華兩地來回跑，是個典型的『空中飛人』，有時在中國一待就是幾個月。」¹¹而國內的富商王根寶則是「中國大發礦業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當余國偉把王根寶的名片仔細看了一下，發現「大發礦業集團總部在上海虹橋商務區，集團下有四家分公司，一家在C市，一家在貴陽，一家在甘肅，都是礦產公司，還有一家貿易公司在上海，王根寶是所有分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¹²

在一個小空間當中，國外資本與國內資本進行了時空的迅速壓縮與打亂。而且資本與權力共生，成為一種複雜的糾纏狀態。當商討完礦產的問題之後，另一名溫哥華富商陸仲任這樣詢問王根寶：「和當地政府合作有把握？那些偏遠地方的政府都是地頭蛇，很黑的，弄不好被人家剝掉一層皮後就把你甩了。」王根寶對於權力的運作顯然頗有心得：「地方官員嘛，你只要確保他們自己的利益就行……我們和他們一起成立礦業開發公司，股份制的，當然我們要拿股權的。他們的地盤裏有礦，但他們如果沒錢把礦開出來，就甚麼都得不到，他們需要我們的資金把死的礦石變成活的礦材，這樣他們位子上既有政績，又可以增加自己的經濟收入，何樂不為？」¹³在一個小小的四個人的對話當中，他們所談到的是跨越中國與加拿大的資本流動、中國的礦產開發與整個中國官場流動與運作方式。

這種混亂的流動狀態也往往成為了生發問題的根源。當然，需要提醒的是，此時的問題已經不是「個人問題」。具體的物質的流動是容易感知的，一個人可以乘坐飛機去全世界幾乎任何一個城市購買物品，而資本流動的內在動因則往往讓人難以察覺。小說中當余國偉發現王根寶存在着虛假資本欺騙的時候，余國偉只能承認自己「看走眼了」。這與其說是「看走眼」，不如說是「看不到」。在這種複雜混亂的空間流動機制面前，個體已經喪失了完全改變外部流動性的可能性——因為理清這種混亂的狀態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種狀況下，個體只能成為一個被動的流動者，這是人已經完全無法控制的「時空危機」。這種流動本身也帶來諸多症候。正如同巴赫金（Mikhail Mikhaïlovich Bakhtin, 1895-1975）

¹¹ 柯兆龍：《局裏局外——溫哥華的中國富豪》（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頁10。

¹² 柯兆龍：《局裏局外——溫哥華的中國富豪》，頁12。

¹³ 柯兆龍：《局裏局外——溫哥華的中國富豪》，頁16。

在描述小說中的時空所指出的那樣：「（小說中）「道路」主要是偶然邂逅的場所。在道路中的一個時間和空間點上，有許多各色人物的空間路途和時間進程交錯相遇……在這裏，人們的命運和生活的空間系列和時間系列，帶着複雜而具體的社會性隔閡，不同一般地結合起來；社會性隔閡在這裏得到了克服。這裏時間仿佛注入了空間，並在空間上流動。」¹⁴

如果繼續探尋，為何 3 次移民的流動性逐漸加強，一方面是整個時代的更改與變遷，如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流動趨勢。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技術不斷演進帶來的時空不斷壓縮。何為時空壓縮？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引述了克恩 1983 年《時間與空間文化，1880-1918 年》（*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一書中的分析：

克恩承認，「電話、無線電報、X 射線、電影、自行車和飛機」為思索和體驗時間的新方式「建立了物質的基礎」。……他的描述突出了驚人的混亂和反抗，它們包括了一系列可能的對於時間和空間體驗中日益感受到的危機。¹⁵

在這裏，技術革新促成了全球範圍內的景觀流動，最後將時間與空間的巨大跨度消解，濃縮為一個具有巨大時空張力的微型景觀。

三、流動與網路的移民文學範式

通過之前 3 類移民方式及其對應題材作品的總結，可以看到的是隨着移民本身的不斷加強，不同題材移民文學文本中的流動性也隨之不斷變化。文本的流動特徵從一開始的人物／空間的簡單移動，再到後來人的流動，最後發展到對於時空相結合的混亂流動。可以說，現代社會的流動性本身已經沒有邏輯可言。

當然，雜亂並不意味着完全的束手無策。筆者所提出的「新移民文學的流動範式」最為關鍵的是表明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即從解決症候轉向呈現症候。更為重要的是在流動範式所基於的「新移民文學」中，「新」已經不局限於當代文學慣常認知的「新移民文學」中的身份之新，更是筆者之前所提到的新的移民趨勢與技術革新所帶來的流動之新。所以，以這個視角來分析，新移民文學首要着眼於人、技術、時空的多重流動性，並且對外部與內部的多重流動有着深刻的認識。容世誠在《尋覓粵劇聲影》就提供了一個外部的 circulation（流動，流轉）與內部 network（網路）的一個理論模型，指出流動屬於外部（表層）的可以感知的諸多現象，而網路則提供了不同力量間相互作用的場域。它們往往難以

¹⁴ 〔俄〕巴赫金著，白春仁譯：《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444。

¹⁵ 哈維著，閻嘉譯：《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331-332。哈維對於時空壓縮的詳細討論，可參頁 324-385。

被人們所明顯感知，卻真正決定了外部的流動。¹⁶

以容世誠的理論模型審視移民文學，很顯然在過去，寫作者與批評者採用的模式並非完全不屬於流動網路範式。因為「民族認同」、「民族邊緣化」等語詞也指明了民族力量的決定作用，即：隱藏在外部流動之下的是一種「民族網路」。但是，在之前的3次移民潮的文本分析中可以得出的是，「民族性」所形成的民族網路只是一種假像。真正驅使外部流動的網路則主要是政治網路、資本網路與技術網路。這3種網路驅使外部流動的關係更為複雜，有時相互協作，有時相互制約，形成了一個內與外複雜混亂的流動狀態。

遺憾的是，大部分文學作品並沒有對於這種內部的驅動進行真正的意識。轉向特稿，則提供了一些移民文學的書寫可能。僅在「非虛構」這一層面上的寫作目的來說，特稿寫作者與移民文學的作家是殊途同歸的。他們都起始於事件的真實，但是新聞工作者所受的訓練使得他們並沒有犯傳統左翼書寫的錯誤。他們並沒有希望探究出一個事件的內在動因，而是儘量呈現出一個事件外在與內在的全貌——這與「移民文學的流動範式」的最終目的不謀而合。如特稿〈赴美產子：沒有鄉愁的新移民〉，就對移民產子的問題進行了呈現。¹⁷顯然，這篇特稿中的「赴美產子」這一行為本身就具有不同於傳統認知的移民特徵——一個非移民者在特定的時間來到海外生產，便可以代替自己的子女完成所有的移民過程，也就是題目中所說的「沒有鄉愁的新移民」。廣義上來講，這些新生兒是移民者，但從法律上來講，他們一出生就是「公民」，而並非移民。所以，這種奇怪的流動基礎是基於國家的制度網路。然而，僅僅有制度基礎，人是無法形成流動的。資本網路的迅速進入使得移民者真正形成了「流動大潮」。正如同特稿中這樣描述：

只要有房源，有客源，其他的事都可以交給專人來做。這條產業鏈已經細分到，有人專為月子中心安裝中文電視，有人專為孕婦提供短期英語培訓，有人專為新生兒辦理身份證件……房子，成為了制約月子中心繼續擴大規模的關鍵因素。羅蘭崗以及其他傳統意義上的華人區，已經無法承載更多的月子中心。哪裏有房子，月子中心的經營者們就將目光投向哪裏。¹⁸

非常具有灰色幽默的是，資本的流動擴張此次受限並不是因為地理上的跨度，而是因為地理空間的耗竭，即赴美產子的人多到超出了月子中心建立的上限。很顯然，這部特稿提供了最為經典的、內部資本與政治網路對於外部個人流動所起促進與互動作用的例證。國家政治網路提供了一種可能，而資本網路迅速介入建立起了全球化的流動關係，並形成了表層的「赴美產子新移民」。

然而，並非所有的「產子移民」的結果都令人滿意。《南方週末》的特稿〈「雙非」

¹⁶ 容世誠：《尋覓粵劇聲影——從紅船到水銀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6-26。

¹⁷ 何瑤：〈赴美產子：沒有鄉愁的新移民〉，〈<http://men.163.com/special/report45/>〉[檢索日期：2017年3月12日]。

¹⁸ 何瑤：〈赴美產子：沒有鄉愁的新移民〉。

離港潮：做回內地人到底有多難〉提供了另外一種情況的範本。並非所有的「產子移民」都選擇美國作為移民地，有的選擇與大陸更近、花銷更加低廉的香港作為目的地。從題目上來看，如果有「離港」，必然有「入港」的緣由。內地人子女們入港的原因是簡單而直接的：「在經濟更為發達的香港，他們的孩子能獲得更優質的教育和更豐厚的福利，從而有更光明的前途。」而當這些父母的子女們逐漸長大的時候，香港社會本身的階層固化成為了阻滯這些孩子們的困境，但悖論在於：「在香港，公民身份的確立實行『落地原則』，只要一出生就自然擁有且很難自由放棄，但內地的戶籍制度又執行單一戶籍原則，將這些「雙非」家庭推進兩難的境地。」最後，特稿頗有意味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梁楠沒有想更多，她只是記得五歲兒子問到「媽媽，我是香港人嗎」時自己不知如何作答的窘迫。自 2008 年夫妻二人讓兒子降生香港，到如今決定讓其離港「返鄉」，回到原點——六年就快要過去，他們卻再也「不知道原點在哪裏」。¹⁹

「不知道原點在哪裏」，一句看似無奈的話蘊含着整個系統的困境。從外部的流動視角來看，喪失了原點意味着整個流動性的停止——沒有起點自然也就不存在任何流動的可能。而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原點的不斷變化。從一開始，父母們對於赴港生子這一行為遵循的是內部資本網路的邏輯：相對於經濟更為發達的香港，作為原點的內地成為他們流動的起始。而回歸本身也是由於內地經濟的迅速崛起，使得香港轉而成為了流動的原點。這種原點的相互轉換很明顯是由於內部資本網路的邏輯。「返港」的困難則是由於制度網路本身的阻滯，使得邏輯更為複雜。在慣常認知當中，政治與資本往往會相互協作。但是在個人層面，一些人在這種網路流動之時卻往往並沒有這麼幸運，有時會在內部網路的相互糾纏中成為兩者的犧牲品。這些跨境子女們正是屬於此類。

所以，我非常讚賞於這篇特稿的題目「雙非」。從法律制度上來說，不存在「雙非」的可能性。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幾乎不可能存在着兩者都不屬於的共同境況。推向這種尷尬的是兩種網路的相互對峙：制度網路中，這些孩子不屬於大陸；而在資本網路中，這些孩子又不屬於香港。故而，最終形成了「雙非」的窘境。

四、結論

這裏，我想對於當今的新移民現狀本身進行總結。首先，移民這一行為存在着兩個方面的景觀——外部流動與內部的網路。在過去的移民文學當中，表層的流動往往指單一的出國行為，即地理層面上國家的改變。而當下的新移民的狀態則是主要分為 3 種流動方式：人的流動、物質流動與時空流動。這 3 種得益於現代技術的支援都使得本身概念進行了擴

¹⁹ 何謙〈雙非離港潮，做回內地人到底有多難〉<<http://www.infzm.com/content/90894/>>[檢索日期：2017 年 3 月 12 日]。

張，不再局限於過去的慣常認知。今天，差異較大的不同地域之間的人的流動同樣也可以稱為移民。新移民中的物質流動多種多樣，形式更加繁複。物質、空間、時間都可以在當下新技術的支撐下進行流動。

在過去的移民文學中，決定外部流動的往往是內在的民族網路。即民族之間的相互連接成為了提供認同與安全感的最為重要因素，從而驅動了外部的人的流動。而新移民文學當中驅動外部人、物質、時空流動的則是出於 3 種網路：政治制度網路、資本網路與技術網路。前兩種網路分別代表着國家權力與資本本身的運作模式與強大力量。在這種相互錯雜而又異常強大的控制當中，新移民本身的生存境況無疑愈發的複雜；流動本身也可能隨着內部網路的中斷而突然停止。所以，雖然在表面上，我們可以看到流動的情況變得五花八門：「入港離港」、「逃離一線城市」。但實際上，這些流動的內在因果仍舊在於內在網路的延伸與阻滯。橋接網路與流動的則是技術網路。鐵路、飛機、現代通訊……這是內部網路傳遞給外部流動的五花八門的工具。

那麼，梳理這個新範式的必要又在何處？閻連科曾經在香港科技大學講述這樣一次經歷。在法國巴黎文學節，眾多外國作家異口同聲地表示自己喜歡的作家是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最喜歡的作品是《百年孤獨》。隨後他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論斷：「自 21 世紀之初直到現在，人們的寫作都還在 20 世紀對現代性求新創造的慣性裏。人們一直還沒有明白，屬於 21 世紀的文學是甚麼。」²⁰

顯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不只是閻連科，某種意義上來說，先鋒文學的急速消退，也意味着一種敘述方式的無力。更多的作家將自己的作品緊緊貼近現實，甚至不惜將新聞題材融合進小說當中。有的批評者曾用「小說新聞化」對這種現象進行定義，並指出：「作家迫不及待地把新聞素材加以戲劇化處理，迅速進入公共領域，無非是試圖證明在各種媒介／話語相互競爭、多元共生的時代裏，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媒介／話語，依然保持了它充沛、積極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關懷的品格。」²¹

這種現象無論是原因或是目的，都是希望於現實發現更大的可能。但是，大部分人所忽略的一個問題是：一個人所聽、所見的就是真正的真實嗎？大部分作家忽視了這個問題，便急匆匆地將自己所認為的真實糅合進了創作當中。流動網路結構提供的一個反思在於：流動與表層的現實本身的狀態是混亂而無跡可尋的。作家與批評者所要做的不僅是介入現實，更需要探尋與呈現出如同流動網路結構中的表面之下的真實性。

²⁰ 閻連科：〈20 世紀文學寫作：精神經驗——20 世紀文學的新源頭〉，《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 1 期，頁 26-32。

²¹ 方岩：〈當前長篇小說的現狀與可能——從一場小說家的對話談起〉，《當代作家評論》2016 年第 3 期，頁 35-45。